



“长兴三年”石砚，“长兴”为五代后唐明宗李嗣源年号，砚底刻有“张师进记”及“长兴三年三月内将钱壹仟五佰文买之”铭文。



“天策府宝”鎏金铜钱，五代十国时期的货币。



杭州平安里吴越国捍海塘遗址。

高帽：佛祖都救不了天下百姓，现在只有您能救他们了。对方一高兴，就顺水推舟，稍加约束契丹军纪。他还主持刊行了印刷版《九经》，此前，儒学经典只有手抄本，有笔误的文本仍在民间传习。清末的美国传教士卡特在《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》里声称，冯道等官员在印刷史上的成就可以和欧洲印刷《圣经》的古腾堡媲美，后者开启了欧洲文化新纪元。

保持仁爱的态度，熟稔中枢事务、恪守技术官僚的本分，暂抛君臣之义不为某个政权的前途负责、只按照个人内心准则平静地工作着，是冯道圆熟的政治手段、有所担当的政治人格。

吴越国银阿育王塔。



天下止戈

广顺二年（952年），郭威拜谒曲阜文庙。《太平年》里七情不上脸的冯令公，终于喜形于色，“儒”遇知音真龙。从“天子，兵强马壮者当为之，宁有种耶？”，到皇帝重新充分意识到文明与教化的紧要性，强干弱枝、重文轻武的艰难转折，不是一蹴而就的。

在陈桥驿被部下“黄袍加身”，

完成五代最后也是最成功一次军事政变的赵匡胤，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是怎样坐上这个位子的，比任何人都担心这个位子的失去。如何摆脱“五代十国魔咒”让大宋“活”得长久，成为老赵家亟需解答的历史课题。毛元佑、雷家宏合著的《开太平：宋太祖赵匡胤》一书分析道，“杯酒释兵权”解除了石守信等开国元勋的军职，武将权力被剥夺。随后，赵匡胤改革军事体系，釜底抽薪：将全国精锐士兵编入中央禁军，地方只留羸弱的厢军；实行

更戍法，使将领不专兵、士兵不知将，兵将分离；地方军政长官多用文臣，并设通判加以牵制。在中央，枢密院掌调兵权，三衙（殿前司、侍卫亲军马军司、侍卫亲军步军司）掌统兵权，二者皆直接向皇帝负责。连串设计环环相扣，欲从制度上彻底消灭任何拥兵自重的“造反”可能性。

与此同时，赵匡胤大力抬高文官地位，扩大科举取士规模，誓言“宰相须用读书人”。他立下“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”的祖宗家法，为宋代有目共睹的士大夫政治创造了宽松环境。这些举措与压制武将相辅相成，共同构成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。无论后世如何调侃“巨唐”